ISSN 1023-2842
中山管理評論　2017 年六月號
第二十五卷第二期　p.367-398
DOI: 10.6160/2017.06.03

董事會政治關聯、客戶重要性對財務報導舞弊之影響

Impacts of Board Political Connection and Client Importance on Fraudulent Financial Reporting

劉若蘭* *Jo-Lan Liu*
臺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
Department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李旻育 *Min-Yu Li*
安侯建業會計師事務所
Department of Auditing, KPMG Taiwan Taipei Office

本本文引用格式建議：劉若蘭、李旻育，2017，「董事會政治關聯、客戶重要性對財務報導舞弊之影響」，中山管理評論，25 卷 2 期：367-398。

Suggested Citation: Liu, J. L. and Li, M. Y., 2017, "Impacts of Board Political Connection and Client Importance on Fraudulent Financial Reporting," **Sun Yat-sen Management Review**, Vol. 27, No. 2, 367-398.

* 通訊作者：劉若蘭(國立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e-mail: lrl@nutc.edu.tw。作者感謝總編輯以及匿名審查委員提供的寶貴意見。投稿日期：2015 年 12 月 31 日；第一次修改日期 2016 年 1 月 30 日；第二次修改日期 2016 年 5 月 2 日；接受日期：2016 年 5 月 24 日

摘要

本研究探討董事會政治關聯以及公司對會計師的重要性，對公司發生財務報導舞弊之影響。實證結果發現，董事會具政治關聯的公司，財務報導舞弊發生率較低。受查公司對簽證會計師的重要性愈高，會因為會計師對客戶的經濟依賴效果大於聲譽維護效果，而導致財務報導舞弊發生的機率增加。由四大會計師事務所查核與公司支付審計公費較高，能降低財務報導舞弊的發生率。在公司治理變數方面，核心代理成本愈高，發生財務報導舞弊的機率愈高，而獨立董事席次比、機構投資人持股比率、董監事持股比率，能夠降低財務報導舞弊發生之風險。本研究之實證結果支持公司的董事會成員具政治關聯以及會計師事務所透過品質管制以強化會計師的獨立性，皆有助於提升公司治理品質，進而降低財務報導舞弊的風險。

關鍵詞：董事會政治關聯、客戶重要性、財務報導舞弊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impacts of board political connection and client importance on fraudulent financial reporting. The empirical results reveal that firms with board political connection have lower occurrence rate of fraudulent financial reporting. However, client importance i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the incidence of fraudulent reporting because the effect of economic dependence is stronger than the concerns of reputation protection for the auditors. Firms that were audited by Big-4 and paid higher fees have lower occurrence rate of fraudulent financial reporting. As to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variables, firms with higher core agency costs have higher likelihood of fraudulent financial reporting. Firms with higher percentage of independent directors on the board, institutional investor ownership, and director and supervisor ownership have lower likelihood of fraudulent financial reporting. The empirical results support that having politically connected board of directors in the firm can improve corporate governance as well as having audit firms that strengthen their independence through quality control.

With improved corporate governance quality, firms therefore can mitigate the incidence of fraudulent financial reporting.

Keywords: Board Political Connection, Client Importance, Fraudulent Financial Reporting

壹、緒論

因企業發生不實財務報導的舞弊案件頻傳，使得投資人重視公司治理品質與會計師的獨立性。以美國的安隆(Enron)事件為例，該企業的管理當局善用政商關係，並透過財務操控、窗飾財務報表及內線交易等方式獲取不法利益，再加上簽證會計師與安隆關係甚密[1]，無法公正客觀的出具查核報告，因而發生財務報導舞弊，造成資本市場的動盪，簽證會計師也因簽證不實遭受懲處，甚而導致會計師事務所倒閉。以我國的力霸集團為例，創辦人王先生曾任商業總會理事長和 15 年國民黨中常委，其子曾擔任不分區立法委員，政商關係良好，後因利用虛設人頭公司，掏空公司資產弊案，引起檢調關注，而簽證會計師也因查核疏忽受到金管會懲戒之處分。在一連續的弊案之後，各國紛紛推動相關公司治理的規定，期能提升公司管理當局的監督機制與會計師事務所的審計品質。

以往文獻探討企業舞弊發生之因素，多著墨於會計師獨立性之監理規範，而未考量公司管理階層的政治關聯[2](political connection)亦可能是引發不實財務報導的關鍵因素。以公司經營角度觀之，公司將社會關係與政治權力相結合，形成政治關聯是相當普遍的存在方式，它掩蔽且合法地透過潛規則

[1] 安隆公司每年支付安達信會計師事務所(Arthur Anderson LLP)鉅額費用（為其第二大受查客戶），其中非審計服務費用甚至超過審計公費，加上安達信為其提供簽證服務長達十七年，安隆公司高階主管亦不乏來自安達信會計師事務所，二者過往甚密。美國證管會(SEC)調查安隆弊案時，簽證會計師竟然銷毀文件，迫使安達信會計師事務所走入歷史。(官月緞、郭子建，2011)

[2] 政治關聯為企業與政府部門或擁有政治權力的個人之間形成之非正式、特殊的政商關係，徵象為企業高層管理人員(如董事長、CEO、董事)及大股東擁有在政府部門任職的經歷，或者透過公益事業及人際關係網路建立與政府的關係等 (Schipper, 1989)。

將關係資本轉化為經濟資源 (Krueger, 1974)。公司基於本身利益之考量，高階管理人員藉由政治之投資，拓展政治人脈網路並提升對政府政策制定的影響力，以改善企業的外部環境，進而增加經濟市場中的競爭優勢 (張琬喻、張凱雯，2011)。政治關聯並非腐敗，但政治手段與政商關係之運用若損及投資大眾，則非社會大眾所樂見。以往研究發現公司的董監事成員若具有政治關聯時，可能因為特殊關係，進而對公司產生影響 (Francis et al., 2009)。公司透過一些方式與政府官員進行協商交易，致使具政治關係企業的資訊不對稱情形較為明顯 (Shleifer & Vishny, 1994)，公司的股票資訊內涵較差 (Kusnadi & Srinidhi, 2015)。我國早期的經濟發展過程中，許多企業的經營者透過政治關係掌握了台灣的經濟命脈，也透過此關係獲得許多利益 (翁慈青、紀信義，2014)，而近期亦有許多公開發行公司邀請政治人物擔任公司的董事會成員[3]，因此，董事會成員具有政治關聯是否能夠提升公司的財務報導品質，降低不實財務報導的發生率是值得探討議題。

另一方面，從會計師的獨立性觀之，當會計師面對重要客戶時，聲譽維護效果與經濟依賴效果之間的取捨，將決定審計品質是否受損的重要決定因素。以往研究有以審計公費衡量客戶重要性，檢視客戶重要性與財務報導品質之關係 (DeFond et al., 2002; Ashbaugh et al., 2003; Chung & Kallapur, 2003)。Sharma et al. (2011) 研究發現客戶重要性與所得調增的盈餘管理呈顯著正向關係，而審計委員會的運作可以調節兩者的關係。Heninger (2001) 研究指出受查客戶之應計數越高，會計師涉入訴訟之機率也隨之提升。然而，以往研究並未進一步探討會計師是否會受到重要客戶的影響而發生財務報導簽證不實的情況，故本文擬探討之。

本研究以我國上市櫃公司為研究對象，參考以往研究蒐集舞弊樣本的方法 (Chen et al., 2006; Markelevich & Rosner, 2013)，以公司於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簡稱投資人保護中心)，曾被以財務報導不實表達為由，對公司提起集體訴訟做為財務報導舞弊樣本。採取一筆舞弊樣本配對三筆無財務報表舞弊之樣本 (林嬋娟、張哲嘉，2009)，為避免無財務報導舞弊樣本實際上有發生舞弊而未被發現的可能性於計量上可能產生的問題，

[3] 標題：政治人物跳槽投信業，例如：前國民黨秘書出任大華投信董事長、前經濟部長王志剛擔任復華投信董事長、前財政部長邱正雄擔任大華證券董事長、立委曾永權擔任寶泰投信董事長 (今周刊，2000/10/31)；(http://www.moneydj.com/KMDJ/Report/ReportViewer.aspx?a=e7b0edcf-a7bc-11d4-886f-00e018b00c53)

本研究參考 Chen et al. (2006)、Wang (2004) 的方法，運用部分可觀察資訊之雙變數概率計量模型(bivariate probit model with partial observability)進行迴歸分析。實證結果發現：(1)董事會具政治關聯，董事會成員的政治背景能力，能抑制財務報導舞弊發生的風險。(2)主簽會計師面對重要客戶時，審計品質會降低，導致財務報導舞弊發生的風險增加，顯示主簽會計師對於重要客戶的經濟依賴效果大於聲譽維護效果。其次，四大會計師事務所與公司支付審計公費較高，能降低財務報導舞弊的發生率。在公司治理變數方面，核心代理成本愈高，發生財務報導舞弊的機率愈高，而獨立董事席次比、機構投資人持股比率、董監事持股比率，能夠降低財務報導舞弊發生之風險。本文以公司曾被提起集體訴訟者作為衡量財務報導舞弊的直接證據，可補充間接衡量財務報導舞弊研究的不足，而以往文獻對於企業舞弊的探討，多著墨於會計師獨立性之監理規範，而未考量公司管理階層的政治關聯；對於客戶重要性與財務報導品質關係，亦未進一步檢驗對財務報導舞弊的影響。本文結果能對公司治理、財務報導舞弊等文獻提供新的實證證據，並且可供公司在尋找董監事成員時，所需具備的知識與背景，以及會計師事務所品質管制的參考依據；亦可供主管機關制定公司治理等規範之參考。

本研究共分五節，第壹節為緒論，第貳節為文獻探討與研究假說之建立，第參節為研究設計，包括實證模型之建立、變數定義、以及研究期間、樣本選取與資料來源，第肆節為實證結果分析，最後為結論與管理意涵。

貳、文獻探討與研究假說之建立

本節包括董事會政治關聯與不實財務報導之相關文獻，以及客戶重要性與不實財務報導之相關文獻介紹，並且建立研究假說。

一、董事會政治關聯與不實財務報導

以往文獻指出政治關聯對經營績效有正向顯著影響，因為政治關聯的公司容易取得融資機構的信任，並且較有足夠之資訊計畫及採納利於公司之優惠政策，以增加企業之績效與獲利 (Niessen & Ruenzi, 2010)。當公司面臨財務困難時，具有政治關連的公司較易獲得債務減免或是政府的直接補助；或是享有較佳的租稅優惠 (Faccio et al., 2006; Faccio, 2010)。以中國企業為例，

黨員資格代表其政治地位，私人企業所有者的黨員身分對於他們所屬企業的績效有正向顯著影響 (Li et al., 2008)；公司在面臨危機時，較易更換並任命有政治關聯的高級主管，而且新任命的主管能夠提升公司績效 (Hu & Leung, 2012)，但無助於改善公司長期績效 (姚珊珊，2014)；當國有上市公司的高階主管具有政治關聯，會減弱董事會的獨立性 (Ding et al., 2014)，而且此政治關聯變成因績效不好被撤換的保護傘 (You & Du, 2012)。上述結果顯示在外部監理機制較弱的市場，政治聯結可做為外部監理機制的替代品 (Hu & Leung, 2012)。相反地，亦有文獻發現政治關聯對經營績效有負向影響，例如，印尼政府對於強制揭露資訊的要求低，因此具政治關聯之上市公司傾向於向國內籌資而較不會採行國際融資策略，如此可能影響公司的長期績效 (Leuz & Oberholzer-Gee, 2006)。義大利的上市公共事業，董事會成員具政治關聯者對公司績效有負向顯著影響 (Menozzi et al., 2011)。在台灣，具有政治背景的董事將為公司帶來較高的違約風險，故該公司的信用風險偏高，且會產生較高的負債資金成本 (翁慈青、紀信義，2014)。

關於董事會政治關聯對於財務報導品質之影響，以台灣企業為例，當企業的董事長或總經理有政黨傾向，可使取得資金的成本降低，且獲得中華信評機構給予較佳的評等等級 (黃玉麗等，2012)，而且企業與不同政黨的政治關聯，獲得的優惠利率也不盡相同 (Yeh et al., 2013)；然而，從優惠借款價格角度觀之，雖然公司治理、政治關聯都能使公司獲得優惠的借款價格，但具有良好公司治理的公司，較不傾向建立政治關聯 (Shen et al., 2015)。Guedhami et al. (2014) 研究顯示具政治關聯企業較願意聘任四大會計師事務所，此現象在開發中國家更為明顯，顯示這些企業積極地改善盈餘管理程度並且提升會計透明度，以說服外部投資者使企業享有較低的權益資金成本。Yang (2013) 研究指出在中國非前 10 大會計師事務所的合夥人，若擔任公開發行公司審議委員會的委員(具政治關聯)，則較可能同意受查公司窗飾財務報表，而非協助公司提升財務報導品質，故公司公開發行後盈餘快速下降；然而，前 10 大會計師事務所合夥人若擔任審議委員會委員者，則無此現象，表示前 10 大會計師事務所合夥人若具有政治關聯，能夠提升公司財務報導品質，而非從此政治關聯中獲利。

然而，支持董事會政治關聯與財務報導品質兩者具負向關係的文獻認為因具政治背景之企業較易隱匿、掩藏及拖延財務報導，而增加投資人之資訊成本 (Schipper, 1989; Leuz et al., 2003)，因此當企業之董監事具有政治關聯

時，其盈餘品質明顯低於不具政治背景之企業 (Shleifer & Vishny, 1994; Borisova et al., 2012)，特別是大股東與政府高層關係良好的企業，其會計資訊品質較差 (Chaney et al., 2011)。具政治關聯的公司的股票資訊內涵較差，其盈餘反應係數較低 (Kusnadi & Srinidhi, 2015)。

綜上所述，由於 Guedhami et al. (2014) 研究顯示具政治關聯企業積極地改善盈餘管理程度並且提升會計透明度，以說服外部投資者，使企業享有較低的權益資金成本。而在台灣，具政治關聯的企業享有優惠的借款利率與價格 (Yeh et al., 2013; Shen et al., 2015)。Yang (2013) 則發現具政治關聯的前 10 大會計師事務所，能夠提升受查公司的財務報導品質，而非從政治關聯中獲得審計公費利益。故本研究認為若企業的董事會成員若具有政治關聯，將對不實財務報導舞弊發生率有負向影響，故建立本研究假說 1：

H1：董事會具政治關聯對財務報導舞弊發生率有負向影響。

二、客戶重要性與不實財務報導

以往文獻以經濟依賴理論與聲譽維護理論來驗證客戶重要性是否會損及會計師獨立性，因而影響審計品質。根據經濟依賴理論，會計師可能會因為經濟誘因而妥協受查公司對於會計處理或查核意見型態的偏好，因而損害審計品質 (DeAngelo, 1981)。Ferguson et al. (2004) 研究發現客戶重要性與異常應計項目的絕對值、財務報表重編機率皆呈正向關聯，表示受查客戶愈重要，其審計品質愈低。Ghosh & Pawlewicz (2009) 證實客戶重要性與盈餘反應係數之間呈負相關，表示客戶愈重要，其盈餘與股價之相關性愈低，即盈餘缺乏資訊內涵。國內學者李建然、陳政芳 (2004) 以會計師事務所的組別為基礎，實證結果顯示若客戶重要性越高，會計師給予的盈餘管理程度越大。上述文獻支持會計師會因為重要客戶所產生的經濟依賴而降低審計品質。

另一方面，依據聲譽維護理論，雖然會計師對重要客戶的經濟依賴程度較高，基於重要客戶的高知名度，若爆發審計失敗，將使會計師聲譽遭受嚴重損害且面臨龐大的訴訟成本，因此，會計師有誘因維護聲譽與規避訴訟風險，對於重要客戶所出具之意見類型反而抱持較為保守穩健的傾向 (Lys & Watts, 1994)。以往研究發現非五大會計師事務所與五大會計師事務所相似，對於財務困難公司，較會出具繼續經營疑慮意見，而且對於重要客戶沒有給

予較高的盈餘管理程度 (Hunt & Lulseged, 2007)；而在博達案之後，會計師允許重要客戶的盈餘管理行為轉趨保守 (Duh et al., 2007)；而在安隆案之後，會計師重視聲譽維護效果甚於經濟依賴效果 (楊炎杰、官月緞，2006)。

綜上所述，雖然在重大會計弊案之後，會計師給予重要客戶的盈餘管理程度轉趨保守 (Duh et al., 2007; 楊炎杰、官月緞，2006)，但尚無研究探討會計師個人對重要客戶發生不實財務報導之影響。依據相關研究指出客戶重要性愈高，則發生財務報表重編機率愈大 (Ferguson et al., 2004)。受查客戶的重要性愈高，其公司的盈餘資訊內涵愈低 (Ghosh & Pawlewicz, 2009)，顯示會計師會因客戶的重要性而減損財務報導品質。因此，本研究認為會計師受到經濟誘因影響，降低對重要客戶的審計品質，使得客戶發生不實財務報導的風險增加。故建立本研究假說 2：

H2：客戶重要性對財務報導舞弊發生率有正向影響。

參、研究設計

本節包括實證模型之建立與變數定義，以及資料來源、研究期間與樣本選取之說明。

一、實證模型之建立

本研究採取一筆舞弊樣本配對三筆無財務報表舞弊之樣本，參考 Wang (2004)、Chen et al. (2006) 的方法，運用部分可觀察資訊之雙變數概率計量模型進行迴歸分析，以解決未觀察到的財務報導舞弊樣本被視為沒有舞弊公司的辨識問題[4]。為檢驗本研究假說，建立模型(1)進行檢定，其中 β_1、β_2 分別用以驗證董事會政治關聯、客戶重要性對財務報導舞弊之影響，實證模型建立如下，相關變數說明詳表 1。

$$\begin{aligned} FRAUD = {} & \alpha + \beta_1 PC + \beta_2 IMPT + \beta_3 LOSS + \beta_4 OCF + \beta_5 RETURN + \beta_6 PLEDGE \\ & + \beta_7 DIRSHARE + \beta_8 LEV + \beta_9 LNAUDIT + \beta_{10} BIGN + \beta_{11} OUTER + \beta_{12} DUAL \\ & + \beta_{13} ABSROADA + \beta_{14} SWITCH + \beta_{15} INVREC + \beta_{16} LNTA + \beta_{17} DEV + \phi IND + \varepsilon \end{aligned} \quad (1)$$

[4] Chen et al. (2006, p.438, 439)、Wang (2004, p.37)。

表1 變數定義

變數	預期符號	定義
FRAUD		衡量財務報導舞弊；若當年度公司被以不實財務報導提起集體訴訟者，視為舞弊樣本，其值為1，否則為 0。
PC	-	衡量董事會政治關聯；若董監事現在或過去曾擔任過政治相關職務者，其值為1；否則為0。
IMPT	+	為會計師的客戶重要性衡量之，公式=受查公司營收取對數/會計師全部上市櫃客戶營收取對數。
LOSS	+	前期淨損；若公司前期發生虧損者，其值為 1；否則為 0。
OCF	-	營業現金流量；為營業活動現金流量除以期初總資產。
RETURN	+/-	年度股票報酬率。
PLEDGE(%)	+	董監質押股數佔董監持股數之比率
DIRSHARE(%)	+/-	董監事持股比例。
LEV(%)	+	總負債佔總資產之比率。
LNAUDIT	-	將支付與會計師之審計公費，依六級級距分類並取自然對數。
BIGN	-	五大/四大會計師事務所者，設為 1；否則為 0。
OUTER	+/-	外部(個人、未上市公司、基金會、上市公司)董監事席次/董監事總席次。
DUAL	+	若董事長兼任總經理，其值設為 1；否則為 0。
ABSROADA	+	裁決性應計數取絕對值。
SWITCH	+	若公司當年度更換會計師者，其值為 1；否則為 0。
INVREC	+/-	(應收帳款+存貨)/總資產。
LNTA	+/-	總資產取自然對數。
DEV	+	盈餘股份偏離差，為股份控制權減盈餘分配權。
IND		產業虛擬變數。
ε		迴歸殘差項。

資料來源：本資料整理

二、變數定義

（一）應變數之衡量

1. 財務報導舞弊(FRAUD)

以公司曾被投資人保護中心以當年度財務報導不實為由提起團體訴訟者，視為財務報導舞弊樣本。若當年度曾發生不實財務報導者，其值為 1，否則為 0。

（二）研究變數之衡量

1. 董事會政治關聯(PC)

採用 Faccio et al. (2006)、翁慈青、紀信義 (2014) 的衡量方式，將公司之董事會任何一位成員目前或過去擔任相關政治職務者[5]，表示該董事會具有政治關聯，PC 值為 1，否則為 0。

2. 客戶重要性(IMPT)

以往研究以受查客戶之公費收入與會計師全部上市櫃客戶公費收入之比值來衡量該會計師所面臨之財務誘因效果 (Chung & Kallapur, 2003)。但因國內法規規定公開發行公司僅於符合特定條件者[6]，方須揭露審計及非審計公費

[5] 相關政治職務包括中央政府官員(中央政府之五院之正、副院長、秘書長、各部會主管、副主管、政務委員、總統府各部門主管或副主管；地方政府之省政府各部會主管、副主管、直轄市長、院轄縣市長)、政黨黨職(各政黨黨主席、副主席、秘書長、中央委員、中央常務執行委員、中央執行委員、中央評議委員、黨代表、縣市主委)及民意代表(縣市長、立法委員、國民大會代表、縣市議員、省議員)。

[6] 證期局於 2002 年 10 月修訂「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公開發行企業符合下列條件時應揭露會計師公費資訊：(1)給付簽證會計師、簽證會計師所屬事務所及其關係企業之非審計公費占審計公費之比例達四分之一以上，或非審計公費達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者，應揭露審計與非審計公費金額及非審計服務內容。(2)更換會計師事務所且更換年度所支付之審計公費較更換前一年度之審計公費減少者。(3)審計公費較前一年度減少達百分之十五以上者。2007 年 1 月起，會計師公費資訊改由「公開發行企業年報應行記載事項準則」規範，並將非審計公費達新台幣五十萬元以上的條件廢除。2009 年 12 月「公開發行企業年報應行記載事項準則」進行修訂，規定企業可選擇以級距或以個別揭露金額方式揭露會計師公費資訊，揭露條件仍維持不變，並將金額級距分為 6 級：(1)低於 2,000 千元；(2)2,000 千元（含）～4,000 千元；(3) 4,000 千元（含）～6,000 千元；(4)6,000 千元（含）～8,000 千元；(5)8,000 千元（含）～10,000 千元；(6)10,000 千元（含）以上。參

資訊，導致難以獲取全部企業之公費資訊，故參考以往研究 (楊炎杰、官月緞，2006；官月緞、郭子建，2011)，以受查客戶營業收入取對數佔主簽會計師全部上市櫃客戶營業收入取對數之比率，衡量研究樣本之客戶重要性。

（三）控制變數之衡量

舞弊三角(fraud triangle)最早由 Cressey (1953) 提出，當舞弊發生時可能存在誘因或壓力、機會、態度行為合理化之因素。我國審計準則第 43 號公報中也定義三個於舞弊存在時極有可能的因素/分類。[7]參考以往研究 (Markelevich & Rosner, 2013)，將控制變數區分為誘因或壓力、機會、態度或行為合理化、以及其他類型，並且加入公司治理變數：董監事質押比率、董監事持股比例、外部董監事席次比、董事長兼任總經理、盈餘股份偏離差等變數。茲分別說明如下：

誘因或壓力

1. 前期淨損(LOSS)

Markelevich & Rosner (2013) 認為企業獲利不佳時，會有財務壓力及營運困難等問題，公司愈會發生財務報導舞弊。因此，本研究預期前期淨損與不實財務報導呈正向關係。當企業前期淨損者，其值為 1，否則為 0。

2. 營業現金流量(OCF)

Dechow et al. (1995) 的研究顯示，營業現金流量與裁決性應計數有密切負向關聯。營業現金流量若太低，則可能舉債解決現金不足，造成管理當局的壓力，預期此變數與財務報導舞弊呈反向關係。

考廖秀梅等 (2012) 的做法，自 2009 年開始，若公司揭露金額級距的審計公費，則以級距中間值代入。該研究指出選擇性樣本(強制揭露)與完整樣本(自願性揭露)的結構性變化並不重大，可忽略選擇性樣本可能存有樣本偏誤性問題。

[7] 公報附錄中提及每個舞弊因子的具體例示，也就是舞弊徵兆，提醒會計師或查核人員，財務報表中可能存有舞弊。第一為誘因/壓力(Incentives/Pressures)，公司或管理階層受到壓力及/或誘因而產生舞弊行為，包括公司發生財務困境，企業快速成長及新法規的規範。第二為機會(Opportunity)，讓舞弊有可以得手之機會，多指內部控制之缺失，如控制環境無效，有重大會計估計科目及跨國之重大交易。第三為態度行為合理化(Rationalization)，係指一人態度的偏差，可能是由於個人的人格特質或道德觀異於常人之故。

3. 股票報酬率(RETURN)

Markelevich & Rosner (2013) 認為股價波動會對管理當局造成壓力與誘因進行財務報導舞弊，Chen et al. (2006) 以股票報酬衡量公司的財務壓力，故加入此變數於實證模型。

4. 公司董監質押比率(PLEDGE)

公司治理變數，Kao et al. (2004) 認為代理問題導致董監事股權質押會造成公司績效不佳。Lee & Yeh (2004) 指出董監事股權質押比率與公司財務困難呈顯著正相關。陳安琳等 (2013) 發現董監質押比率越高的公司，其信用風險也越高，且監察人缺乏獨立性的情形也越嚴重。故本研究預期公司董監質押比率愈高，愈會發生財務報導舞弊。

5. 董監事持股比例(DIRSHARE)

為公司治理變數，Wang (2004) 指出公司內部人持股比例與企業舞弊發生率有關，故加入董監持股比率於模型中。

6. 負債比率(LEV)

Chen et al. (2006) 指出負債比率會影響企業舞弊之發生率，故加入模型中。預期負債比率與財務報導舞弊呈正向關係。

機會

7. 審計公費(LNAUDIT)

Markelevich & Rosner (2013) 認為審計公費是影響不實財務報導發生率的重要因素。Higgs & Skantz (2006) 發現審計公費與盈餘反映係數呈正相關，隱含審計公費愈高，其盈餘品質亦愈高。故本研究預期審計公費[8]與財務報導舞弊呈反向關係。

8. 四大會計師事務所查核(BIGN)

Becker et al. (1998) 研究發現大型事務所擁有較多資源與專業知識人員，並且為維護事務所聲譽，會要求公司提供較佳的會計資訊品質。故本研

[8] 詳附註 6。

究預期由四大會計師事務所查核者，發生財務報導舞弊的機會較低。若受查公司由四大會計師事務所查核者，其值為 1，否則為 0。

9. 外部董監事席次比(OUTER)

為公司治理變數，Weisbach (1988) 認為外部董事較能超然監督管理當局。本研究採外部(個人、未上市公司、基金會、上市公司)董監事席次佔全體董監事總席次比例衡量之。

10.董事長兼任總經理(DUAL)

為公司治理變數，若公司之董事長兼任總經理時，其值為 1，否則為 0。當公司的董事長兼任總經理時，較可能侵蝕董事會之獨立性，降低董事會監督功能 (Fama & Jensen, 1983)，以及企業發生財務危機的機率較高 (李春安、徐傳瑛，2010)，故預期此變數與財務報導舞弊呈正向關係。

態度或行為合理化

11.裁決性應計數(ABSROADA)

裁決性應計數較高的公司，較有操弄財務報表之虞 (Healy, 1985)。當受查客戶之應計項目愈大，會計師發生審計失敗之機率亦愈高 (Lys & Watts, 1994)，會計師涉入訴訟之機率也愈高 (Heninger, 2001)。故預期裁決性應計數與財務報導舞弊呈正向關係。本研究以修正式 Jones model 計算裁決性應計數 (Ashbaugh et al., 2003)，並取絕對值(請詳附錄 1)。

12.是否更換會計師(SWITCH)

Markelevich & Rosner (2013) 認為當會計師發生異動時，將釋放出公司內部營運可能出現異常之訊息，公司發生財務報導舞弊之可能性較高。若公司當年度更換會計師，其值為 1，否則為 0。

其他

13.應收帳款及存貨合計數佔總資產的比例(INVREC)

過去研究發現實帳戶中存貨及應收帳款較容易受到公司的操弄 (Markelevich & Rosner, 2013)，故加入模型中。

14.總資產取自然對數(LNTA)

公司規模會影響財務危機發生的可能性 (李春安、徐傳瑛，2010)，故加入模型中。

15.盈餘股份偏離差(DEV)

公司治理變數，台灣上市公司多為家族控制型態，而當控制股東的控制權愈高，或控制權偏離現金流量權的程度愈高時，控制股東與小股東間利益衝突的核心代理問題就愈大 (Fan & Wong, 2002)。Bozec & Bozec (2013) 研究指出控制股東的控制權與現金流量權偏離程度愈高，會使核心代理成本與審計風險增加。因此，加入此變數於模型中，預期 DEV 愈大，發生不實財務報導的風險愈高。

參考 Wang (2004)、Chen et al. (2006) 的部分可觀察資訊之雙變數概率計量模型，本研究將 PC、IMPT、LOSS、OCF、RETURN、LNAUDIT、BIGN、OUTER、ABSROADA、LNTA、INVREC、SWITCH、DEV 變數用於建立發生財務報導舞弊(commit fraud)模型。而 LOSS、LEV、RETURN、BIGN、SWITCH、DIRSHARE、PLEDGE、DUAL、DEV 變數用於建立財務報導舞弊被偵測發現(detection fraud)模型，因為不良的財務結構或績效通常會引起主管機關的調查 (Chen et al., 2006)，而股權結構也會影響舞弊的偵查發現 (Wang, 2004)。

三、研究期間、樣本選取與資料來源

我國於 2002 年實施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守則，加強公司治理與會計師簽證之獨立性，因此，本研究樣本期間為 2002 年至 2013 年，有關財務報導舞弊樣本之資料係取自投資人保護中心網站[9]中的團體訴訟及仲裁的歷史求償案件。若公司當年度曾被以財務報導不實表達為由而提起集體訴訟者視為有財務報導舞弊，經排除金融保險業、資料缺漏者後，共選出 85 筆舞弊樣本(37家公司)，採取一筆舞弊樣本配對三筆無財務報表舞弊之樣本 (林嬋娟、張哲嘉，2009)，配對方法為與舞弊樣本相同年度、相同產業、資產規模相近之沒有舞弊公司，共計 340 筆觀察值。有關董事會政治關聯之資料係參考翁慈

[9] http://www.sfipc.org.tw/MainWeb/article.aspx?L=1&SNO=aUlkGSaRjJ4NVesky03Z/g=&TY=02&KW=vuDatTPWyt8=&P=1

青、紀信義 (2014)，取自於中央及地方政府各部會之網站、總統府公報、中華民國行憲政府職名錄、各政黨之網站與可查得知書面資料、以及各相關單位所提供之資訊逐筆建構而得；而客戶重要性、公司財務資料、股權結構資料係來自台灣經濟新報(TEJ)的審計品質資料庫、財務資料庫、公司治理資料庫。

表 2 為財務報導舞弊樣本的年度與產業分佈，其中以電子工業所佔比例最高(40.0%；34 家公司)，以化學生技產業所佔的比率最低(1.17%，1 家公司)。而發生不實財務報導的年度以 2005 年至 2007 較多，逾 10%以上。

表2 財務報導舞弊樣本之分佈

產業 年度	食品 工業	紡織 工業	電機 機械	電器 電纜	化學 生技	鋼鐵	電子 工業	建材 營造	航運	貿易 百貨	其他	合計	%
2002	2	0	0	0	0	1	1	0	0	1	0	5	5.9
2003	1	0	0	0	0	1	1	0	0	2	0	5	5.9
2004	1	1	0	1	0	0	2	0	0	2	0	7	8.2
2005	1	1	1	1	0	1	3	1	1	2	0	12	14.1
2006	1	1	0	1	0	1	5	0	1	2	1	13	15.3
2007	0	1	0	1	1	0	6	1	1	1	1	13	15.3
2008	0	1	1	0	0	0	2	1	0	0	2	7	8.2
2009	0	1	0	0	0	0	5	0	0	0	2	8	9.4
2010	0	1	0	0	0	0	3	0	0	0	2	6	7.1
2011	0	0	0	0	0	0	5	0	0	0	1	6	7.1
2012	0	1	0	0	0	0	1	0	0	0	1	3	3.5
2013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0
合計	6	8	2	4	1	4	34	3	3	10	10	85	100.0
%	7.1	9.4	2.4	4.7	1.1	4.7	40.0	3.5	3.5	11.8	11.8	100.0	

註：產業係根據 TEJ 分類。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肆、實證結果分析

本節包括敘述性統計分析與平均數差異檢定、相關係數分析、迴歸實證結果分析，以及額外測試。

一、敘述性統計與平均數差異分析

表 3 為樣本敘述性統計量，舞弊樣本有 85 筆，非舞弊樣本 255 筆，全體

財務報導舞弊樣本平均數為 0.250。董事會成員現在或過去曾擔任過政治相關職務的比例約為 22.9%，在舞弊樣本中有政治關聯的比率約為 14.1%，顯著低於沒有舞弊樣本的政治關聯比率。受查公司佔主簽會計師所有簽證上市櫃公司的重要性比率(IMPT)平均數為 18.963%，在舞弊樣本中 IMPT 平均數為 29.801%，高於全部樣本平均數，顯示舞弊樣本佔主簽會計師所有簽證公司的重要性比率較高。控制變數方面，在誘因與壓力因素，樣本中發生前期損失(LOSS)的平均數約為 0.376，舞弊樣本 LOSS 的平均數為 0.576；全體樣本的營業活動現金流量(OCF)平均數為 0.044，而舞弊樣本的 OCF 為負數；全體樣本的股票報酬率(RETURN)平均數為 24.990%，舞弊樣本公司 RETURN 平均數為 10.187%，這些資料顯示有較高營業損失、現金流量不足、股票報酬率較低的公司，較易發生不實財務報導。全體樣本的董監事持股質押比率(PLEDGE)約為 14.611%，而舞弊樣本公司的 PLEDGE 平均數為 21.239%；全體樣本的董監事持股比率(DIRSHARE)為 21.480%，高於舞弊樣本的持股率；全體樣本負債比率(LEV)平均數為 48.593%，低於舞弊樣本 LEV 平均數 55.748%，顯示董監事質押比率愈高、負債比率愈高，董監事持股比率愈低者，公司愈有誘因或壓力從事財務報導舞弊。

在機會因素，全體樣本審計公費取自然對數(LNAUDIT)之平均數為 13.532，舞弊樣本 LNAUDIT 為 11.529；全體樣本由四大會計師事務所查核(BIGN)的樣本公司超過半數以上(73.5%)，舞弊樣本有 51.8%由 BIGN 查核，顯示舞弊公司支付較低的審計公費，較不傾向聘任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全體樣本的外部董監事席次比(OUTER)約為 36.157%，而董事長兼任總經理(DUAL)約有 26.5%。在態度及行為合理化因素，全體樣本的裁決性應計數之絕對值(ABSROADA)為 0.117，涉案年度中曾更換會計師(SWITCH)之比率為 46.5%，舞弊樣本與非舞弊樣在 ABSROADA、SWITCH 變數沒有呈現顯著差異。其他因素方面，應收帳款及存貨合計數佔總資產比例(INVREC)平均數為 0.299，舞弊樣本的 INVREC 小於非舞弊樣本。盈餘股分偏離差(DEV)平均數為 6.120，公司規模(LNTA)平均數為 15.186，由於選擇資產規模相近者進行樣本配對，故舞弊與非舞弊樣本的 LNTA 無顯著差異，而兩者的 DEV 亦無顯著差異。

由 Panel B 的平均數差異檢定顯示，董事會具政治關聯的公司發生財務報導舞弊的平均數為 0.154，顯著低於無政治關聯的公司(平均數 0.279)。而不論是否具有政治關聯，兩者的客戶重要性(IMPT)比率、財務狀況與結構

(LOSS、RETURN、LEV)沒有顯著差異。具政治關聯樣本 OCF 高於不具政治關聯樣本；具政治關聯樣本的 PLEDGE 平均數(9.127%)顯著低於不具政治關聯樣本，而董監事持股比率(25.271%)則顯著高於不具政治關聯樣本，這些資料顯示董事會具政治關聯，公司的財務狀況與結構健全，董監事質押率低、持股率高，公司較無誘因或壓力從事不實財務報導。具政治關聯樣本的 LNAUDIT 平均數(14.025)顯著高於不具政治關聯樣本(13.385)，而且約有75.6%是由四大會計師事務所查核，顯示具政治關聯公司較願意聘任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且願意支付較高的審計公費以維持公司的審計品質。INVREC 平均數低於不具政治關聯樣本，而 DEV 則顯著高於不具政治關聯樣本，隱含董事會具政治關聯，公司的股份控制權與盈餘分配權差異大，呈現較高程度的核心代理問題。

表3 敘述統計量與平均數差異檢定

Panel A：樣本敘述統計量(n=340)					
變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中位數	最大值
FRAUD	0.250	0.434	0	0	1
PC	0.229	0.421	0	0	1
IMPT(%)	18.963	23.153	2.790	10.085	100
LOSS	0.376	0.485	0	0	1
OCF	0.044	0.131	-0.705	0.036	0.497
RETURN(%)	24.990	93.308	-88.174	2.444	631.767
PLEDGE(%)	14.611	24.264	0	0	92.040
DIRSHARE(%)	21.480	14.018	1.1	18.005	66.970
LEV(%)	48.593	23.259	0.476	48.610	216.440
LNAUDIT	13.532	2.715	2.476	13.816	16.013
BIGN	0.735	0.442	0	1	1
OUTER(%)	36.157	23.705	0	38.462	87.500
DUAL	0.265	0.442	0	0	1
ABSROADA	0.117	0.153	0.001	0.076	1.005
SWITCH	0.465	0.499	0	0	1
INVREC	0.299	0.174	0.000	0.287	0.869
LNTA	15.186	1.639	11.700	15.379	18.609
DEV	6.120	11.143	0	1.300	54.300

Panel B：平均數差異檢定

	PC=1 (n=78)	PC=0 (n=262)	差異檢定	FRAUD=1 (n=85)	FRAUD=0 (n=255)	差異檢定
變數	平均數	平均數	t 值	平均數	t 值	t 值
FRAUD	0.154	0.279	-2.240**,b	1	0	
PC	1	0		0.141	0.259	-2.244**,b
IMPT	20.376	18.543	0.613	29.801	15.351	5.169***,a
LOSS	0.359	0.382	-0.362	0.576	0.310	4.512***,a
OCF	0.062	0.039	1.351*	-0.026	0.068	-5.991***,a
RETURN	34.067	22.288	0.979	10.187	29.925	-1.694**,a
PLEDGE(%)	9.127	16.244	-2.288**,c	21.239	12.402	2.941***,b
DIRSHARE(%)	25.271	20.350	2.747***,b	14.830	23.696	-5.244***,a
LEV(%)	47.282	48.983	-0.567	55.748	46.208	3.328***,a
LNAUDIT	14.025	13.385	1.834**,a	11.529	14.200	-8.672***,a
BIGN	0.756	0.729	0.480	0.518	0.808	-5.463***,a
OUTER	37.070	36.778	0.886	37.009	35.873	0.382
DUAL	0.231	0.275	-0.772	0.212	0.282	-1.277
ABSROADA	0.110	0.119	-0.428	0.107	0.120	-0.688b
SWITCH	0.423	0.477	-0.838	0.400	0.486	-1.381*
INVREC	0.266	0.309	-1.941**,b	0.273	0.308	-1.631*
LNTA	15.502	15.092	1.950**,b	15.153	15.197	-0.213
DEV	9.844	5.011	3.415***	6.533	5.982	0.394

註：1.變數定義詳表一。

2.平均數差異採用 t 檢定；*、**、***分別表示達 10、5%與 1%之顯著水準。

3.中位數差異則採用 Wilcoxon 等級符號檢定；a,b,c 分別分別表示達 1%、5%與 10%之顯著水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相關係數分析

表 4 為研究變數之相關係數，由表顯示董事會具政治關聯(PC)與財務報導舞弊(FRAUD)呈負向顯著關係，表示具政治關聯的公司發生不實財務報導的機率較低，與假說 1 的預期方樣一致。客戶對會計師的重要性(IMPT)與 FRAUD 呈正向顯著關係，顯示簽證會計師對受查客戶的經濟依賴程度愈高，發生不實財務報導的機率愈高，符合假說 2 的預期方向。在控制變數方面，LOSS、PLEDGE、LEV、DEV 與 FRAUD 呈顯著正向關係，隱含營運狀況不佳、董監質押比率較高、負債比率較高、股份控制權與盈餘分配權差異大的公司，較易發生不實財務報導。而現金流量較充裕、股票報酬率高、董

監持股比率高、支付較高審計公費、由四大會計師事務所查核者，發生不實財務報導的機率較低。

三、迴歸結果分析

表 5 為政治關聯、客戶重要性與財務報導舞弊之結果，由欄 1 的概率模型(simple probit)結果顯示董事會政治關聯(PC)與財務報導舞弊(FRAUD)呈負向關係[10]，迴歸係數-0.408(z 值-1.640)，表示董事會具政治關聯，公司發生不實財務報導的機率愈低，意味著董監事的政治背景，能夠加強董事會的監督品質，改善公司的財務報導品質，抑制財務報導舞弊之發生率，假說 1 獲得支持，與 Guedhami et al. (2014) 指出具政治關聯企業會積極改善盈餘報導品質的研究結論相似。然而，客戶重要性(IMPT)對 FRAUD 有正向顯著影響，迴歸係數 0.017(z 值 3.910)，表示受查公司對簽證會計師的重要性愈高，會計師對客戶的經濟依賴效果大於聲譽維護效果，導致審計品質降低，公司發生財務報導舞弊機率增加，假說 2 獲得支持。

為了解決未觀察到的財務報導舞弊樣本被視為沒有舞弊公司的辨識問題，表五欄 2 為部分可觀察資訊之雙變數概率計量模型(bivariate probit)之迴歸結果，在 P(Fj=1)的舞弊發生結果中顯示 PC 與 FRAUD 呈負向顯著關係，迴歸係數-0.379(z 值-1.910)，表示董事會具政治關聯，公司發生不實財務報導的機率愈低，與欄 1 結果一致。IMPT 對 FRAUD 有正向顯著影響，迴歸係數 0.008(z 值 1.780)，顯示受查公司對會計師的重要性愈高，會計師的審計品質會降低，導致公司發生財務報導舞弊機率增加，與欄 1 結果一致。

控制變數方面，欄 2 結果顯示公司前期發生虧損(LOSS)，則本期發生財務報導舞弊的機率較高，而被偵查發現的機率也愈高，表示營業績效是影響財務報導舞弊發生與被發現的重要因素。營運現金流量(OCF)愈高，發生財務報導舞弊的機率愈低，表示公司營運資金愈充足，愈不會從事財務報導舞弊之行為。股票報酬率(RETURN)愈低，發生舞弊與被偵查發現舞弊的機率愈高。公司支付的審計公費(LNAUDIT)愈高，由四大會計師事務所查核者(BIGN)，愈不會發生財務報導舞弊行為，被偵查發現的機率也愈低，顯示審

[10]考量橫斷面及時間序列可能之相依問題及避免產生變異數異質，採 Two-Way Cluster-Robust Standard Errors 之檢定統計方法，結果顯示 PC 的迴歸係數-0.403(z 值-1.115)；IMPT 迴歸係數 0.017(z 值 3.310)。

表4 各變數相關係數

變數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FRAUD	1																
2.PC	-0.12 b	1															
3.IMPT	0.27 a	0.03	1														
4.LOSS	0.28 a	-0.02	0.06	1													
5.OCF	-0.31 a	0.07	-0.08	-0.38 a	1												
6.RETURN	-0.09 c	0.05	-0.05	0.03	0.06	1											
7.PLEDGE	0.16 a	-0.12 b	-0.02	0.04	-0.06	-0.00	1										
8.DIRSHARE	-0.27 a	0.15 a	-0.02	-0.05	0.10c	0.03	-0.25 a	1									
9.LEV	0.18 a	-0.03	0.30a	0.16 a	-0.23 a	-0.05	0.24 a	-0.06	1								
10.LNAUDIT	-0.43 a	0.10 b	-0.13 b	-0.20 a	0.25 a	0.02	0.05	0.10 c	-0.11 b	1							
11.BIGN	-0.28 a	0.03	-0.47 b	-0.25 a	0.27 a	0.10 c	-0.11c	0.13 b	-0.22 a	0.15 a	1						
12.OUTER	0.02	-0.05	-0.06	0.10 c	-0.11 b	-0.03	-0.34 a	0.00	-0.15 a	-0.02	0.05	1					
13.DUAL	-0.07	-0.04	-0.09	0.00	0.04	0.04	-0.18 a	-0.06	-0.10 c	0.08	-0.00	0.20 a	1				
14.ABSROADA	-0.04	-0.02	-0.01	0.13b	0.15 b	0.15 a	-0.02	0.12 b	-0.03	0.13 b	-0.04	0.05	0.05	1			
15.SWITCH	-0.07	-0.05	-0.03	0.03	-0.03	-0.12 b	0.09	0.04	0.08	0.16 a	-0.08	-0.02	0.03	-0.07	1		
16.INVREC	-0.09	-0.11 c	-0.04	-0.08	-0.13 b	0.13 b	-0.11 b	-0.05	0.00	0.06	-0.01	0.33 a	0.06	-0.04	-0.00	1	
17.LNTA	-0.01	0.11 c	0.06	-0.36 a	0.24 a	-0.06	0.35 a	-0.20 a	0.27 a	0.21 a	0.08	-0.50 a	-0.22 a	-0.17 a	0.03	-0.20 a	1
18.DEV	0.02 a	0.18 a	0.06	0.01	0.12 b	-0.05	0.08	0.27 a	0.20 a	0.11 b	0.05	-0.31 a	-0.19 a	0.01	-0.05	-0.18 a	0.30 a

註：1.變數定義及說明同表一。

2.a、b 與 c 分別表示達 1%、5%與 10%之顯著水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計公費愈高，由四大查核者，有較高的審計品質，能減緩公司從事財務報導舞弊的機會。在公司治理變數方面，董監事持股比率(DIRSHARE)愈高，公司發生財務報導舞弊的機率愈低。股份控制權與盈餘分配權(DEV)差異愈大，表示核心代理問題愈大，公司愈可能發生財務報導舞弊。董監事質押比率(PLEDGE)、董事長兼任總經理(DUAL)對 FRAUD 有正向影響，但未達統計顯著性。然而，值得注意的事，外部董監事席次比率(OUTER)愈高，卻無法降低財務報導舞弊之發生率。在其他因素方面，公司的應收帳款與存貨(INVREC)大小、公司規模(LNTA)也會影響 FRAUD 的發生率，公司規模愈大者，發生財務報導舞弊的機率愈高。

四、額外測試

（一）客戶重要性之其他衡量方式

以資產總額為基礎，計算受查客戶資產總額取對數佔主簽會計師所有全部上市櫃客戶資產總額取對數之比重，衡量客戶對主簽會計之重要性，以部分可觀察資訊之雙變數概率計量模型進行迴歸分析，結果(未列表)與表五相似，PC 與 FRAUD 呈負向顯著關係，迴歸係數-0.374(z 值-1.870)，支持董事會政治關聯對降低財務報導舞弊風險的功效。IMPT 與 FRAUD 呈正向關係，迴歸係數 0.007(z 值 1.770)，顯示當會計師面對重要客戶時，經濟誘因效果大於聲譽維護效果，導致審計品質降低，公司發生財務報導舞弊的風險增加，其餘控制變數結果與表五相似，不擬贅述。另以公司家數為基礎，計算受查客戶佔主簽會計師全部上市櫃客戶家數之比重，衡量客戶對主簽會計之重要性，結果顯示 IMPT 對 FRAUD 呈正向顯著關係，迴歸係數 0.007(z 值 1.670)，其餘變數結果與表五相似。

（二）考量客戶重要性之非線性關係

因假說 2 結果呈現 IMPT 對 FRAUD 有正向顯著影響，顯示客戶重要性對主簽會計師的經濟誘因效果大聲譽維護效果，故客戶愈重要，愈可能導致審計品質下降，公司發生財務報導舞弊的可能性增加。相反地，也有可能是客戶不是很重要的時候，經濟誘因效果小於聲譽維護效果，表示客戶重要性與財務報導舞弊可能存在非線性關係，為解決此問題，將客戶重要性變數取平方(IMPT_SQR)，加入迴歸模型中，迴歸結果(未列表)顯示 PC 與 FRAUD

呈負向關係，迴歸係數-0.402(z 值-1.670)，IMPT 與 FRAUD 呈正向關係，迴歸係數 2.598(z 值 1.580)，IMPT_SQR 與 FRAUD 呈負向關係，迴歸係數-0.009(z 值-0.510)，未達統計顯著性，結果仍支持客戶重要性對財務報導舞弊影響之正向關係。

（三）考量其他公司治理變數

由於獨立董事比率可降低公司資產掏空案的發生 (李春安、徐傳瑛，2010)，機構投資人持股有助於降低企業的信用風險 (林宛瑩等，2009)，故將獨立董事比率(INDEP)與法人持股比率(INST)加入模型中，以補充公司治理變數對財務報導舞弊風險之影響。由表六結果顯示 PC、IMPT 對 FRAUD 的影響與表五結果相似，INDEP 與 FRAUD 呈負向顯著關係，迴歸係數-0.013(z 值-1.890)，表示獨立董事席次比率高，愈能發揮監督財務報導之功能，降低公司發生不實財務報導之機率。法人持股比率(INST)與 FRAUD 呈負向關係，迴歸係數-0.007(z 值-1.420)，隱含法人持股可提升財務報導品質，降低舞弊發生之風險。

表5 政治關聯、客戶重要性與財務報導舞弊之實證結果

		欄 1	欄 2	
		simple probit model	bivariate probit model	
		$P(Z_{j=}1)$	$P(F_j=1)$ 舞弊發生	$P(D_j=1 \mid F_j=1)$ 舞弊被發現
變數	預期符號	係數 (Z 值)	係數 (Z 值)	係數 (Z 值)
截距項	+/-	2.791	-0.281	-1.136
		(1.660)*	(-0.190)	(-2.270)**
PC	-	-0.408	-0.379	
		(-1.640)**	(-1.910)**	
IMPT	+	0.017	0.008	
		(3.910)***	(1.780)**	
LOSS	+	0.254	0.368	0.561
		(1.080)	(1.780)**	(2.110)***
OCF	-	-3.698	-3.325	
		(-3.320)***	(-3.010)***	
RETURN	+/-	-0.001	-0.001	-0.001
		(-1.280)	(-0.610)	(-1.310)
LNAUDIT	-	-0.292	-0.253	
		(-6.190)***	(-6.260)***	
BIGN	-	-0.186	-0.473	-1.159
		(-0.750)	(-2.240)**	(-4.080)***

OUTER	+/-	0.008	0.009	
		(1.370)	(1.800)*	
PLEDGE	+	0.010		0.003
		(2.780)***		(0.780)
DIRSHARE	+/-	-0.038		-0.028
		(-3.040)***		(-1.670)**
LEV	+	-0.008		0.009
		(-1.500)*		(1.640)*
DUAL	+	-0.090		0.181
		(-0.400)		(0.700)
ABSROADA	+	0.343	0.027	
		(0.500)	(0.400)	
SWITCH	+	-0.129	-0.216	-0.429
		(-0.660)	(-1.190)	(-1.590)*
INVREC	+/-	-0.659	-1.116	
		(-1.070)	(-2.080)**	
LNTA	+/-	0.109	0.240	
		(1.140)	(2.650)***	
DEV	+	0.026	0.003	0.017
		(2.810)***	(0.410)	(1.480)*
IND		Included	Included	
觀察值		340	340	
Wald chi_square		120.90***	155.440***	
Pseudo R^2		0.402		
Log Pseudolikelihood		-114.391	-163.720	

註：1.變數定義詳表一。2***、**與*分別表示達 1%、5%與 10%之顯著水準，有預期符號採單尾檢定，其餘為雙尾檢定。3.Z 值已調整變異數不齊一。4. F_j=1 表示 j 公司從事舞弊，否則為 0；D_j=1 表示 j 公司從事舞弊被發現，否則為 0；$Z_j=F_j*D_j$。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6 敏感性分析-加入公司治理變數之迴歸結果

		bivariate probit model	
		$P(F_j=1)$舞弊發生	$P(D_j=1 \mid F_j=1)$被發現
變數	預期符號	係數 (Z 值)	係數 (Z 值)
截距項	+/-	0.212	-1.152
		(0.140)	(-2.320)**
PC	-	-0.437	
		(-2.070)**	
IMPT	+	0.007	
		(1.680)**	
LOSS	+	0.332	0.587
		(1.580)*	(2.180)***

OCF	-	-3.146 (-2.840)***	
RETURN	+/-	-0.001 (-0.860)	-0.001 (-1.190)
LNAUDIT	-	-0.264 (-6.450)***	
BIGN	-	-0.399 (-1.760)**	-1.146 (-4.080)***
OUTER	+/-	0.013 (2.300)**	
PLEDGE	+		0.003 (0.820)
DIRSHARE	+/-		-0.029 (-1.820)**
LEV	+		0.009 (1.710)**
DUAL	+		0.232 (0.740)
ABSROADA	+	0.155 (0.210)	
SWITCH	+	-0.178 (-0.960)	-0.450 (-1.520)*
INVREC	+/-	-1.146 (-2.000)**	
LNTA	+/-	0.217 (2.260)***	
DEV	+	0.011 (1.340)*	0.017 (1.820)**
INDEP	-	-0.013 (-1.890)**	
INST	-	-0.007 (-1.420)*	
IND			Included
觀察值			340
Wald chi_square			163.320***
Log Pseudolikelihood			-161.501

註：1.INDEP 為獨立董事席次占全部董監事席次比；INST 為法人持股比率，其餘變數定義詳表一。

2.***、**與*分別表示達 1%、5%與 10%之顯著水準，有預期符號採單尾檢定，其餘為雙尾檢定。

3.Z 值已調整變異數不齊一。4. F_j=1 表示 j 公司從事舞弊，否則為 0；D_j=1 表示 j 公司從事舞弊被發現，否則為 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伍、結論與管理意涵

由於財務報導舞弊案件頻傳，使得公司治理與審計品質備受重視。本文以公司曾被投資人保護中心以財務報導不實表達為由，對公司提起集體訴訟者，作為衡量財務報導舞弊的直接證據，可補充間接衡量財務報導舞弊研究的不足，實證結果顯示董事會具政治關聯，董事會成員的政治背景能力，能降低財務報導舞弊發生的風險。主簽會計師對於重要客戶的經濟依賴效果大於聲譽維護效果，導致主簽會計師面對重要客戶時，審計品質會降低，財務報導舞弊發生的風險增加。在公司治理變數方面，核心代理成本愈高，發生財務報導舞弊的機率愈高，而獨立董事席次比、機構投資人持股比率、董監事持股比率，能夠降低財務報導舞弊發生之風險。四大會計師事務所與公司支付較多審計公費，也能抑制財務報導舞弊的發生率。在管理意涵方面，本文結果支持自由民主經濟環境下(台灣為例)，董事會成員的政治背景知識能為公司帶來好的公司治理品質，抑制不實財務報導的風險，有助於內部公司治理品質之提升。而且加強會計師的獨立性，可降低受查客戶的經濟誘因對審計品質之影響，有助於強化外部公司治理品質。公司有健全的財務狀況、充裕的現金流量，以及較低的負債比率，可減緩財務報導舞弊的發生率。降低公司的核心代理成本，減緩控制股東與小股東的利益衝突，以及強化獨立董事的功能可降低公司發生財務報導舞弊的風險。

以往文獻對於企業舞弊的探討，多著墨於會計師獨立性之監理規範，而未考量公司管理階層的政治關聯，對於客戶重要性與財務報導品質關係，亦未進一步檢驗對財務報導舞弊的影響。本文以部分可觀察資訊之雙變數概率計量模型處理未觀察到的財務報導舞弊樣本被視為沒有舞弊的公司的辨識問題，本文結果能對公司治理、財務報導舞弊等文獻提供新的實證證據，並且可供公司在尋找董監事成員時，所需具備的知識與背景，以及會計師事務所品質管制的參考依據；亦可供主管機關制定公司治理等規範之參考，為本文主要研究貢獻。

由於財務報導舞弊資訊取自投資人保護中心曾對公司提起集體訴訟者為限，受限於該網站資訊更新速度與完整[11]，若未來能取得完整的舞弊犯罪或

[11]資料蒐集期間(截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止)，該網站沒有 2013 年(含)以後之集體訴訟案件，故本研究無法確認 2013 年間是否有新增之案件。

判決確定資料，與董事會政治關聯資料，或是考量政治職務、會計師任期等影響因素，將可使本文結果更具完整與說服力。

附 錄

1. 裁決性應計數的計算方式

本研究採用產業別橫斷面之修正式 Jones model，以觀察期前三年作為估計期，使用普通最小平方法推估觀察期各產業以及各年度模型(a)之係數，代入(b)式，計算出裁決性應計數(DA)。

$$TA_{ijt} / A_{ijt-1} = a_{jt}(1/A_{ijt-1}) + b_{jt}[(\Delta REV_{ijt} - \Delta REC_{ijt})/A_{ijt-1}] + c_{jt}(PPE_{ijt}/A_{ijt-1}) + \varepsilon_{ijt} \quad \text{(a)}$$

$$DA_{it} = \frac{TA_{ijt}}{A_{ijt-1}} - (\hat{a}_{jt}(1/A_{ijt-1}) + \hat{b}_{jt}[(\Delta REV_{ijt} - \Delta REC_{ijt})/A_{ijt-1}] + \hat{c}_{jt}(PPE_{ijt}/A_{ijt-1})) \quad \text{(b)}$$

其中，TA_{ijt} 為第 j 產業中，第 i 家公司，第 t 期之總應計項目；A_{ijt-1} 為第 j 產業中，第 i 家公司，第 t-1 期之總資產；$\triangle REV_{ijt}$ 為第 j 產業中，第 i 家公司，第 t 期之淨銷貨收入變動數；$\triangle REC_{ijt}$ 第 j 產業中，第 i 家公司，第 t 期之應收帳款變動數；PPE_{ijt} 為第 j 產業中，第 i 家公司，第 t 期之財產、廠房及設備；ε_{ijt} 為殘差項。

參考文獻

李建然、陳政芳，2004，「審計客戶重要性與盈餘管理：以五大事務所組別為觀察標的」，會計評論，38 期：59-80。(Lee, J. Z. and Chen, J. F., 2004, "The Effect of Audit Client's Importance on Magnitude of Earnings Manag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udit Groups within the Big Five,"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ccounting Studies**, Vol. 38, No. 1, 59-80.)

李春安、徐傳瑛，2010，「董事會獨立性與企業財務危機關係之研究」，管理與系統，17 卷 3 期：467-499。(Li, C. A. and Hsu, C. Y., 2010, "Board Independence and Financial Distress: Evidence from Taiwan," **Journal of Management & Systems**, Vol. 17, No. 3, 467-499.)

官月緞、郭子建，2011，「客戶重要性、非審計服務與會計師任期對審計品質之影響」，當代會計，12 卷 1 期：1~30。(Guan, Y. D. and Kuo, T. C., "The Impact of Client Importance, Non-audit Service, and Auditor Tenure on Audit Qualit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Vol. 12, No. 1, 1-30.)

林宛瑩、許崇源、戚務君、陳宜伶，2009，「公司治理與信用風險」，臺大管理論叢，19 卷 S2 期：71~98。(Lin, W. Y., Hsu, C. Y., Chi, W. C., and Chen, I. L., 2009,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Credit Risk," **NTU Management Review**, Vol. 19, No. S2, 71-98.)

林嬋娟、張哲嘉，2009，「董監事異常變動、家族企業與企業舞弊之關聯性」，會計評論，48 期：1~33。(Lin, C. J. and Chang, C. C., 2009, "Abnormal Change of Board Members, Family Firms and Fraud,"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ccounting Studies**, Vol. 48, No. 1, 1-33.)

姚珊珊，2014，「政治關聯與財務困境恢復—基於 ST 上市公司[摘帽]的實證研究」，兩岸金融季刊，2 卷 2 期：29~44。(Yao, S. S., 2014,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Financial Distress Recovery: Based on ST Firms Uncapped Empirical Study," **Cross-Sreait Banking and Finance**, Vol. 2, No. 2, 29-44.)

翁慈青、紀信義，2014，「董事會政治背景與企業信用風險之關係」，證券市場發展季刊，26 卷 2 期：43~90。(Weng, T. C. and Chi, H. Y., 2014, "Political connection and Credit Risk," **Review of Securities and Futures Markets**, Vol. 26, No. 2, 43-90.)

張琬喻、張凱雯，2011，「董事政治關聯及政治獻金影響企業價值嗎？」，選舉研究，18 卷 1 期：139~174。(Jang, W. Y. and Chang, K. W., 2011, "Do Directorate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or Political Donations Affect Firm Value?" **Journal of Electoral Studies**, Vol. 18, No. 1, 139-174.)

陳安琳、高蘭芬、陳怡凱、陳烷鈺，2013，「董監事股權質押與公司治理之研究」，中山管理評論，21 卷 2 期：299~337。(Chen, A., Kao, L., Chen, Y. K., and Chen, W. Y., 2013, "Share Collateralization by Directors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Sun Yat-sen Management Review**, Vol. 21, No. 2, 299-337.)

黃玉麗、沈中華、林昆立，2012，「政治關聯(係)與債務資金成本」，管理學報，29 卷 2 期：155~185。(Huang, Y. L., Shen, C. H., and Lin, K. L., 2012,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the Cost of Debt," **Journal of Management**, Vol. 29, No. 2, 155-185.)

楊炎杰、官月緞，2006，「客戶重要性與非審計服務是否影響審計品質? Enron 後的觀察」，會計評論，43 期：27~61。(Yang, Y. J. and Guan, Y. D., 2006, "Do Client Importance and Nonaudit Services Affect Audit Quality? Post-Enron Observation,"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ccounting Studies**, Vol. 43, No. 1, 27-61.)

廖秀梅、王貞靜、戚務君，2012，「一套臺灣完整的審計公費資訊告訴我們什麼？」，中華會計學刊，8 期 1 卷：49~88。(Liao, H. M., Wang, C. C., and Chi, W. C., 2012, "What does th complete Disclosure of Audit Fee Information Tell Us in Taiwan?" **Taiwan Accounting Review**, Vol. 8, No. 1, 49-88.)

Ashbaugh, H., LaFond, R., and Mayhew, B. W., 2003, "Do Nonaudit Services Compromise Auditor Independence? Further evidence," **The Accounting Review**, Vol. 78, No. 3, 611-639.

Becker, C. L., DeFond, M. L., Jiambalvo, J., and Subramanyam, K. R., 1998, "The Effect of Audit Quality on Earnings Management,"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Vol. 15, No. 1, 1-24.

Borisova, G., Brockman, P., Salas, J. M., and Zagorchev, A., 2012, "Government Ownership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Evidence from the EU,"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Vol. 36, No. 11, 2917-2934.

Bozec, Y. and Bozec, R., 2013, "Dominant Shareholders, Excess Control and Audit Fees in Canad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Finance**, Vol. 4, No. 2, 119-142.

Chaney, P. K., Faccio, M., and Parsley, D., 2011, "The Quality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in Politically Connected Firms,"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Vol. 51, No. 1, 58-76.

Chen, G., Firth, M., Gao, D. N., and Rui, O. M., 2006, "Ownership Structure,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Fraud: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Vol. 12, No. 3, 424-448.

Chung, H. and Kallapur, S., 2003, "Client Importance, Nonaudit Services, and Abnormal Accruals," **The Accounting Review**, Vol. 78, No. 4, 931-955.

Cressey, D. R., 1953, **Other People's Money**, 1st, Montclair, NJ: Patterson Smith.

DeAngelo, L. E., 1981, "Auditor Independence, "Lowballing," and Disclosure Regulation,"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Vol. 3, No. 2, 113-127.

Dechow, P. M., Sloan, R. G., and Sweeney, A. P., 1995, "Detecting Earnings Management," **The Accounting Review**, Vol. 70, No. 2, 193-225.

DeFond, M. L., Raghunandan, K., and Subramanyam, K. R., 2002, "Do Non-audit Service Fees Impair Auditor Independence? Evidence from Going Concern Audit Opinions,"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Vol. 40, No. 4, 1247-1274.

Ding, S., Jia, C., Wu, Z., and Zhang, X., 2014, "Executive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Firm Performance: Comparative Evidence from Privately-controlled and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ial Analysis**, Vol. 36, No. 1, 153-167.

Duh, R. R., Lee, W. C., Lin, C. C., and Chu, J. P., 2007, "An Eexperimental Study on Non-audit Service and Auditor Decision: Pre- and Post-procomp Scandal," **Taiwan Accounting Study**, Vol. 6, No. 2, 125-152.

Faccio, M., 2010, "Differences between Politically Connected and Nonconnected Firms: A Cross-country Analysis," **Financial Management**, Vol. 39, No. 3, 905-928.

Faccio, M., Masulis, R. W., and McConnell, J. J., 2006,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Corporate Bailout," **The Journal of Finance**, Vol. 61, No. 6, 2597-2635.

Fama, E. F. and Jensen, M. C., 1983, "Separation of Ownership and Control,"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26, No. 2, 301-325.

Fan, J. P. and Wong, T. J., 2002, "Corporate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the Informativeness of Accounting Earnings in East Asia,"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Vol. 33, No. 3, 401-425.

Ferguson, M. J., Seow, G. S., and Young, D., 2004, "Nonaudit Services and Earnings Management: UK Evidence,"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Vol. 21, No. 4, 813-841.

Francis, B. B., Hasan, I., and Sun, X., 2009,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the Process of Going Public: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Vol. 28, No. 4, 696-719.

Ghosh, A. and Pawlewicz, R., 2009, "The Impact of Regulation on Auditor Fees: Evidence from the Sarbanes-Oxley Act,"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 Theory**, Vol. 28, No. 2, 171-197.

Guedhami, O., Pittman, J. A., and Saffar, W., 2014, "Auditor Choice in Politically Connected Firms,"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Vol. 52, No. 1, 107-162.

Healy, P. M., 1985, "The Effect of Bonus Schemes on Accounting Decisions,"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Vol. 7, No. 1, 85-107.

Heninger, W. G., 2001,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Auditor Litigation and Abnormal Accruals,” **The Accounting Review**, Vol. 76, No. 1, 111-126.

Higgs, J. L. and Skantz, T. R., 2006, “Audit and Nonaudit Fees and the Market's Reaction to Earnings Announcements,”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 Theory**, Vol. 25, No. 1, 1-26.

Hu, F. and Leung, S., 2012, “Appointment of Politically Connected Top Executives and Subsequent Firm Performance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Evidence from China’s Listed SOEs. ”, **2012 Financial Markets & Corporate Governance Conference**, Bundoora, Australia.

Hunt, A. K. and Lulseged, A., 2007, “Client Importance and Non-Big 5 Auditors’ Reporting Decisions,”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 Vol. 26, No. 2, 212-248.

Kao, L., Chiou, J. R., and Chen, A., 2004, “The Agency Problems, Firm Performance and Monitoring Mechanisms: the Evidence from Collateralized Shares in Taiwan,” **Corporate Governance: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Vol. 12, No. 3, 389-401.

Krueger, A. O., 1974,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Rent-seeking Societ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64, No. 3, 291-303.

Kusnadi, Y. and Srinidhi, B., 2015,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Stock Price Informativeness: International Evidence,” http://ssrn.com/abstract=2547896, accessed on January 10, 2015.

Lee, T. S. and Yeh, Y. H., 2004,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Financial Distress: Evidence from Taiwan,” **Corporate Governance: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Vol. 12, No. 3, 378-388.

Leuz, C. and Oberholzer-Gee, F., 2006, “Political Relationships, Global Financing, and Corporate Transparency: Evidence from Indonesia,”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Vol. 81, No. 2, 411-439.

Leuz, C., Nanda, D., and Wysocki, P. D., 2003, “Earnings Management and Investor Protection: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Vol. 69, No. 3, 505-527.

Li, H., Meng, L., Wang, Q., and Zhou, L. A., 2008, “Political Connections, Financing and Firm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nese Private Firm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87, No. 2, 283-299.

Lys, T. and Watts, R. L., 1994, “Lawsuits against Auditors,”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Vol. 32, No. 3, 65-93.

Markelevich, A. and Rosner, R. L., 2013, “Auditor Fees and Fraud Firms,”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Vol. 30, No. 4, 1590-1625.

Menozzi, A., Urtiaga, M. G., and Vannoni, D., 2011, “Board Composition,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Performance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Vol. 21, No. 3, 671-698.

Niessen, A. and Ruenzi, S., 2010, “Political Connectedness and Firm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Germany,” **German Economic Review**, Vol. 11, No. 4, 441-464.

Schipper, K., 1989, “Commentary on Earnings Management,” **Accounting Horizons**, Vol. 3, No. 4, 91-102.

Sharma, V. D., Sharma, D. S., and Ananthanarayanan, U., 2011, “Client Importance and Earnings Management: The Moderating Role of Audit Committees,”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Theory**, Vol. 30, No. 3, 125-156.

Shen, C. H., Lin, C. Y., and Wang, Y. C., 2015, “Do Strong Corporate Governance Firms Still Require Political Connection, and Vice Versa?”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Vol. 39, No. 1, 107-120.

Shleifer, A. and Vishny, R. W., 1994, “Politicians and Firm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09, No, 4, 995-1025.

Wang, T. Y., 2004, “Investment, Shareholder Monitoring and the Economics of Corporate Securities Fraud.” Working Paper, University of Maryland.

Weisbach, M. S., 1988, “Outside Directors and CEO Turnover,”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Vol. 20, No. 3, 431-460.

Yang, Z., 2013, “Do Political Connections Add Value to Audit Firms? Evidence from IPO Audits in China,”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Vol. 30, No. 3, 891-921.

Yeh, Y. H., Shu, P. G., and Chiu, S. B., 2013, “Political Connections,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Preferential Bank Loans,” **Pacific-Basin Finance Journal**, Vol. 21, No. 1, 1079-1101.

You, J. and Du, G., 2012, “Are Political Connections a Blessing or a Curse? Evidence from CEO Turnover in China,” **Corporate Governance: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Vol. 20, No. 2, 179-194.

作者簡介

劉若蘭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副教授，主要教授審計學、會計與公司治理、稅務法規等課程；研究領域為審計相關議題、公司治理、財務會計等。研究成果曾發表於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 Economics、Emerging Markets Finance and Trade、Accounting and Finance Research、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Information System、會計評論、商管科技季刊、中華會計學刊等期刊。

E-mail: lrl@nutc.edu.tw

李旻育

臺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碩士班畢業，目前為安侯建業會計師事務所查帳員。

E-mail: Vincentlee@kpmg.com.tw